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23)04-0001-13

中国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兼论人口红利研究的核心议题

□陆杰华 谷俞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人口历来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自20世纪末以来,人口红利始终是经济学和人口学的重点研究议题,而随着人口转变推进和生产方式转型,我国现实人口条件与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亟须对既有的人口红利研究进行再认识和再建构。基于人口红利研究的演化脉络,梳理中国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的现状,可以发现学界讨论的基本共识、争议焦点,以及在研究范式、理论概念、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归纳出现阶段中国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有:第一次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作用机制及其替代效应、其他广义类型人口红利的驱动作用,以及就业结构性错配和区域发展差异等制约人口红利释放的因素。下一步中国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应以理性认识数量层面的人口机会、培育质量层面的人口潜力、优化人口红利空间配置和产业配置等议题为落点展开。

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人口转变;本土化研究;质量型人口红利

DOI:10.16365/j.cnki.11-4054/d.2023.04.010

一、研究缘起

为解释东亚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实现的经济增长奇迹,西方学者从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角度出发,率先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Demographic Dividend),以表征有利人口条件所形成的经济贡献。人口红利研究范式被引入我国学界后,由于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因而逐渐成为经济学和人口学研究中的重点议题。然而,随着近年来我国人口转变进程的快速推进,人口形势与经济状况发生了深刻转变,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为提高中国人口红利本土化议题的指导性、加强其对现实人口问题的回应,亟须对人口红利相关研究作进一步厘清和探讨。

回顾人口红利研究的本土化进程,在研究范式层面,国内学界对人口红利的分析和讨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概念误读和滥用问题,导致现有研究对有利人口条件的界定和判断较为片面,所选取的人口机会刻画指标也基本嫁接了西方相关研

究,在中国语境下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尚未得到检验,且在测量人口要素经济贡献时,一般仅将核心指标纳入增长回归模型,或是采用宏观模拟方法分解人口因素的经济贡献^{[1][2]}。综合来看,这些指标测算方法相对单一,人口机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也由此被大大简化^[3],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人口红利研究的现实意涵。此外,人口红利本质上是在特定人口转变期所获得的额外生产要素^[4],这一机会窗口带有时间限制特征^[5],因而终究会转向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但中国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具有将人口红利永恒化的认识倾向,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期式微后,又进一步提出了人口质量红利与广义人口红利等类型,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人口红利的研究维度,但也使人口红利的范围逐渐脱离了最初的“人口转变”范畴,加之各个分支领域没能形成体系化的研究理论和标准化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碎片化问题严重,泛化的研究范式也极大地削弱了人口红利理论本身的解释性。

在研究应用层面,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劳动力

收稿日期:2023-05-06

作者简介:陆杰华(1960—),男,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谷俞辰(2000—),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供给充足,叠加有利的政策社会环境,聚集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动能。然而,随着人口转变进程的持续深化,我国总体生育水平稳定下降,老龄化进程加速,社会抚养负担日益加剧,人口问题与人口压力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面对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人口趋势性特征,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明确提出,必须全面认识和正确看待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6]。在这一背景下,为加快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激活潜在人口红利的生产和经济效益,人口红利的本土化研究亟须形成知识合力,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再认识和再建构,以统一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和应用体系推动知识存量的整合对接,并将研究重点聚焦在人口新形势下的核心议题和重点矛盾,以更好地回应现实人口治理需求。

因此,本文在梳理国内外人口红利研究发展脉络的基础上,考察人口红利概念被迁移到国内学界后,在研究范式和研究应用的本土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以期推动本土化研究尽快形成完善的研究体系。而后,本文将基于现阶段我国人口红利相关研究的基本情况,提出未来可以着重关注的本土化研究议题,从而加强研究成果与本土议题的结合。

二、既往人口红利研究的演化脉络

从研究对象和理论建构的角度来看,国内外学界有关人口红利的研究经历了四个主要的演化

阶段(详见图1):20世纪30—40年代,受到初期人口转变理论的影响,关于特定人口结构条件及其经济效益的研究开始兴起,这一时期对人口年龄结构的讨论也逐步成为后续人口红利概念建构的基础;20世纪末,人口红利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被正式提出,用于解释东亚经济在70—80年代的迅猛发展,而后人口红利研究开始起步;21世纪初,后发国家人口转变进程的压缩推动了人口红利研究进入延伸阶段,学界开始关注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下人口红利新的表征,包括预防性储蓄效应与劳动力素质等;现阶段人口红利研究维度则进一步横向扩展,针对日益复杂的人口变动特征,性别红利、长寿红利等广义人口红利类型逐渐被建构起来,人口红利研究正在走向多元化、多层次化。

(一)萌芽阶段:人口转变理论及其现实转向

21世纪前,人口红利尚未形成明确的理论概念和研究领域,但人口转变理论业已成为人口学研究的重要基石。由汤普森(Warren Thompson)、兰德里(Adolphe Landry)、诺特斯坦(Frank W. Notestein)等西方人口学家提出的人口转变理论,旨在阐释人口的发展过程、主要阶段和演变规律,基于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三个基本要素,人口转变理论将人口再生产模式划分为四个基本阶段:首先是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构成的传统人口再生产阶段,这一阶段生产力水平较低、人口死亡率较高,生育率弥补死亡率而保持在较高水平;其次是受益于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的死亡率下降阶段,由于这一时期出生率仍维持高位,因而人口自然增长率快速上升;再次是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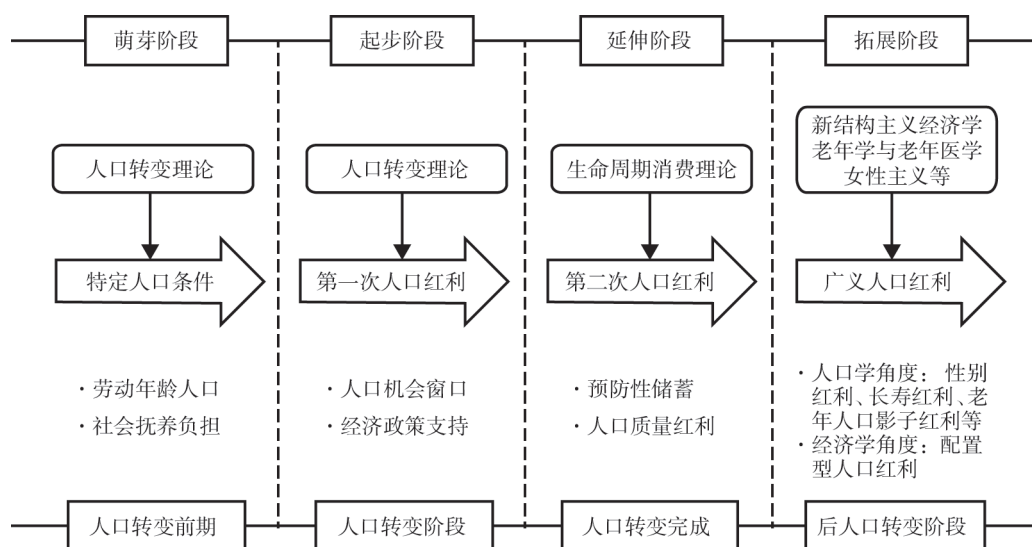


图1 人口红利研究的发展脉络示意图

社会经济因素作用的生育率下降阶段,这一阶段医疗卫生进步的边际收益递减,人口死亡率降速放缓,但受生育意愿惯性影响,出生率的下降通常比死亡率滞后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因而第二和第三阶段之间必然会引发人口数量的急剧膨胀;最后,经历以上发展阶段后,人口增长将最终进入到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构成的现代人口再生产阶段^[7],并可能转为“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状态。因此,人口转变进程就是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由高位均衡向低位均衡转变的过程,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意味着人口转变的完成。

人口转变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人口再生产与社会经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基于这一理论,学界逐渐意识到人口从传统再生产类型向现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过程,会开启人口年龄结构“两头小、中间大”的黄金时期。而随着更多国家进入人口转变进程中,人口年龄结构逐渐成为与人口总量增长同样重要的议题,劳动年龄人口的生产性特征也得到普遍认同,即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较多且比重较大、社会总体抚养负担较轻的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强大驱动。总体而言,人口要素存在内部差异的假设前提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要发现^[8]。不过,这一阶段的人口红利研究仍处于萌芽状态,学界通常使用“人口转变”或“人口转化”来描述人口结构的变化,尚未形成清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直到“人口红利”这一概念被引入经济学领域后,该研究才得到较为明确的界定。

(二)起步阶段:人口红利概念的提出

1998年,大卫·布鲁姆(David Bloom)与杰佛瑞·威廉姆森(Jeffrey Williamson)在研究亚洲经济增长奇迹时使用“demographic gift”一词,用以形容后发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所形成的人口结构优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独特贡献,标志着人口红利概念的正式提出^[9]。同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世界人口现状》报告中使用“demographic bonus”指代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多而占比高、社会总抚养比低的特定阶段^[10],并认为经过良好经济社会政策的激发,特殊的人口条件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这在一定程度上细化了对人口红利概念的建构。2002年以后,学界开始使用“demographic dividend”指征人口红利并延续至今,人口红利的概念也被确定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转变时期利用充足的劳动年龄人口而实现的经

济增长效应^{[11][25]}。由于我国人口转变阶段滞后于日本、韩国等亚洲发达国家,因而国内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及其经济效益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2003年,有学者将人口转变进程中总抚养比低、经济贡献高的特殊阶段描述为“人口机会视窗”^[12],次年,国内学界首次引入“人口红利”的概念,用以分析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所产生的生产效益和经济贡献^{[13][14]}。

可见,自起步阶段开始,人口红利研究就带有鲜明的复合性特征,作为建立在人口学基础上的经济学概念,人口红利同时涵盖了人口机会及其产生经济贡献的过程。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红利指收益减去投入成本后的净利润^[15],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性年龄段的人口份额较高时,就意味着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突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同时社会总抚养负担较低,劳动力资源可以投入更多精力到生产活动中,增加了社会总体的劳动供给时间。在这一条件下,即使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劳动总产出和资本边际报酬率也将同比上升^[16],有效激发短期的经济增长动能。不过,学界在提出人口红利概念时亦意识到:有利的人口条件不会自动转变为现实的经济红利,而是依赖于经济社会政策与人口资源的充分匹配;当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时,只有适龄劳动人口实现充分就业并有效参与到生产过程中,才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在人口机会条件之外,有利于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的配套政策也开始得到学界关注^[13],这期间的主要议题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与保障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体制^[14]、高水平城市化和对外开放^[17]、完善的养老保障与社会保障^[18]、积极的投资环境和资本市场^[19]、有计划的生育政策^[20]、良好的公共卫生条件、稳定的国民储蓄水平^{[11][40-41]}等。

(三)延伸阶段:人口转变结束与第二次人口红利

随着后发国家人口再生产模式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化阶段,人口转变进程被压缩所导致的老龄化问题逐渐显现。2006年,面对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动能的乏力,有学者基于生命周期理论,从微观个体的消费与储蓄行为出发^{[19][21]},提出了“第二次人口红利”(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相关的理论基础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理查德·布伦伯格(Richard Brumberg)、阿尔伯特·安多

(Albert Ando)共同提出消费函数理论中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消费者各阶段的消费水平取决于一生的总收入而非当期收入,理性主体会依据现阶段收入来预期一生的平均收入水平,以达到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配置,因而个体的消费储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基于这一理论,人口转变后期的高抚养比和预期寿命的延长改变了民众的养老预期,在社会抚养负担加剧的背景下,理性个体为保证自己的养老生活质量,会在年轻时调整生命周期收入的分配模式。当预防动机大于当下消费需求时^[22],出于为养老阶段准备充足财产的需要,人们的储蓄动机和储蓄倾向(未来消费)增加^[4],从而提高了社会整体的储蓄水平和资本供给,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第二次人口红利^[21]。已有研究证明,我国的高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下的个体理性选择^[23]。

也有学者认为,如果仅从预防性储蓄和生命周期财富的维度对第二次人口红利进行定义,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难以与第一次人口红利(传统意义上的人口数量红利)相提并论^[24]。对于这一问题,部分研究汲取新经济学相关理论,在人口数量和结构以外,开始关注劳动年龄人口的生产能力,并强调人口质量在第二次人口红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①。

国内学界在对人口质量开展研究的初期植入了“人力资本”的经济学概念,而后逐渐与现实人口条件和人口学研究议题结合,形成“人口质量红利”和“质量型人口红利”的理论概念^{[25][26]},并与预防性储蓄效应共同成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表现形态。与第一次人口红利着重强调劳动力的自然属性不同,人口质量红利关注劳动力的社会属性,即经过健康投资 and 教育培训后形成的劳动力素质:良好的健康状况是劳动力从事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基础^[27],而教育水平的改善可以有效提高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和生产效率^{[24][28][29]}。已有研究发现,劳动力质量的边际效率高于劳动者数量,因而人口质量红利会对第一次人口红利产生替代效应^[30],从而形成超出稳态增长之外的经济成果^[31]。

总体而言,与第一次人口红利相比,第二次人口红利获取渠道的生产性更强,作用机制也由劳

动人口本身转为额外的生产要素(社会储蓄、人力资本等)。这一时期对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讨论基本形成了两条研究路径:一方面,关注由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激发的养老预防动机,分析储蓄率变动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产生的效用;另一方面,探讨健康和教育状况的改善如何通过提高劳动力生产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四)拓展阶段:人口红利走向细化与分化

近年来,随着更多国家进入“后人口转变”阶段,人口要素内部及其与经济环境的互动关系日益复杂,在低生育水平、老龄化加剧等传统问题之外,还出现了各种结构性矛盾。由此,配置型人口红利、性别红利、长寿红利、老年人口影子红利等广义人口红利逐渐被经济学界和人口学界的学者提出并拓展,人口红利概念逐步走向细分,研究也开始分化。

与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相同,性别结构也是生理层面的人口划分方式,但不会受到出生率变动的影响,因而在正常情况下具有相对稳定性。2010年,泛美开发银行两位女性经济学家合著出版《性别红利:充分利用女性的工作》(The Gender Dividend: Capitalizing on Women's Work),标志着“性别红利”概念的提出^[32]。次年,联合国妇女署在《性别红利:促进性别平等的商业案例》(The Gender Dividend: A Business Case for Gender Equality)报告中沿用了这一概念^[33],旨在强调充分利用女性劳动力将有效提升国家人才储备、保障经济增长活力,从而使一个国家获取更高的长期回报率。而后,性别红利逐渐成为人口红利研究中的核心议题之一。但由于女性同时扮演着社会劳动参与者和人口再生产承担者的双重角色,因而性别红利的概念表征具有综合性与开放性,尚未在学界形成统一的界定。学界主要以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为出发点,基于家庭、市场、社会、政府等多元主体,考察女性人口与经济增长、社会生活、福利政策、公共治理等方面的互动,聚焦女性人口在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上的可得性与可及性^[34],并主要从个人发展、家庭发展和经济发展三个层次构建性别红利的分析框架^{[35][36]}。在个体层面,女性在教育、健康、经济机会上的改善能够从根本上提高其可行能力和社会地位,进而

① 已有研究发现,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不仅可以改善自身生产效率,还能有效降低劳动的复杂程度,促进其他要素生产效率的提升,从而实现生产变革与经济增长。参见李钢、梁泳梅、沈可挺:《质量型人口红利对中国未来经济影响评估》,《中国经济学人》(英文版)2016年第1期。

提高女性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回报,有利于获得更多社会资源,实现自身价值。在家庭层面,女性地位的提升有利于增进儿童福祉、改善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消除贫困的代际传递,从而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在经济层面,两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工作待遇有助于女性更充分、更平等地参与社会劳动,提高社会运行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15]。因此,在新的人口发展阶段,如何营造女性友好型的社会环境、支持女性的劳动参与和社会参与,并通过多层次的性别平等实现新的经济效益^[37],成为人口红利研究中新的学术增长点。

此外,在少子化、老龄化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特征明显,为回应劳动年龄人口不足的现实困境、激活潜在的老年人口红利,学界进一步提出“长寿红利”和“老年人口影子红利”等广义人口红利类型。长寿红利(Longevity Dividend)由健康老龄化和生产性老龄化共同作用而成,指代人口寿命延长所带来的经济社会贡献^[38]。一方面,长寿红利强调老年人再社会化的积极意义,医疗条件和营养水平的改善大大延长了人口的生存时间和生命健康期^[39],老年期(尤其是低龄老年期)由此成为全生命周期中知识、技能、经验等最为丰富的阶段,且低龄老年人往往具有较高的社会参与意愿。因此,老年人再就业可以有效增加社会生产性时长,而公益活动和志愿服务等非正式参与活动也有助于挖掘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40]。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居民生活质量持续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也有所增强,因而长寿时代蕴藏着庞大的银发经济消费需求,部分研究已经对银发经济模式下的市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效应展开分析^[41]。而老年人口影子红利关注老年人间接产生的生产效益和经济贡献,在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日趋上升的背景下,健康状况良好、闲暇时间较多的老年人可以为子女提供强有力的代际支持,降低劳动年龄人口因抚育子女和家务劳动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42],使家庭中的劳动者成员更好地实现工作与家庭平衡,提高家庭稳定性与整体发展能力。

在资源禀赋之外,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从区域和产业间人口流动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存量,还取决于其间的配置关系^[43]。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所创造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口流动管制放宽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兴起

的共同作用,市场经济的供需配置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而人口从低生产效率地区向高生产效率地区、从农业部门到非农业部门的流动,不断推动配置型人口红利的充分释放^[44]。因此,在传统人口红利的下沉期,为实现最低生产成本,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学界就如何以人口为载体推动要素禀赋升级、以人口要素结构进行产业和资源配置、以人口空间腾挪和双循环互促实现内生性包容式增长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7]。

三、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的基本共识、争论焦点及其原因

学界普遍对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兑现途径以及在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对劳动力供给条件、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高效的政策制度设计等方面的归因有着共识。但由于经济学和人口学研究范式缺少必要的对话与互动等原因,在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中仍存在对我国第一次人口红利期限的不同看法,对第二次人口红利和广义人口红利概念的使用也存在一定泛化趋势;同时,学界对人口机会窗口的判断标准和人口红利的测算方法尚无定论。

(一)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的基本共识

人口红利研究发展至今,学界对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兑现途径以及东亚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经济增长机制基本达成共识,即人口转型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劳动力供给条件,配合有效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政策制度设计,潜在的人口优势就会转变为实际的经济贡献,而未进入人口转变过程以及在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时未进行相应配套政策支持的国家则难以形成人口红利^[31]。

人口机会窗口开启前的20世纪中期,东亚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约为2%,而随着劳动力供给逐渐向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转变,到1970—1995年期间,东亚地区实现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水平4.1个百分点,其间人口转变的因素大约贡献了1.5—2.0个百分点^{[9][13]}。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一代推动下的日本,经历了1950—1969年和1978—1992年两次人口机会窗口期,前者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23%,也使日本在1972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次人口红利期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则为4.21%。韩国的人口机会窗口约出现在1963—2014年,这一时期政府格外重视教育投入

并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推动国内潜在产能成功转化为出口需求,实现了年均7.50%的经济增速,与新加坡在人口红利时期(1964—201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基本持平,后者约为7.95%^[8]。相较之下,我国由人口红利形成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大致为1978—2010年,在超过10%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驱动下,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到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1.21万亿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8]。从这一时期的人口机会条件来看,我国婴儿潮一代在成年期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恰逢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机遇期;与此同时,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儿抚养比持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生育和养育负担有所减轻,劳动参与率和社会生产率随之提升,标志着第一次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这一劳动力供给上升期又正值我国开始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此时允许劳动人口自由流动,使得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制造业转移,并通过传统型人口红利夯实了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

东亚国家经济增长奇迹也显现出人口转型速度与人口红利的强相关性。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是总和生育率在短期内快速从高位降低至更替水平,从而保证劳动力供给增加和抚养比快速下降同时发生。而大部分先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系自发完成,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缓慢且存在较长时间差,人口机会窗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明显。相较之下,后发国家的人口变化强度更高,高生育意愿和低死亡水平所产生的婴儿潮、劳动年龄人口激增时期的工人潮,以及首波低生育人群,在同一人口世代上完成了时序更迭^[45],从而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机会。

(二)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的争论焦点及其原因分析

1. 关于第一次人口红利期限的争论

当前,在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中仍存在对我国第一次人口红利期限的不同看法。部分学者基于劳动力增速变动,认为我国自20世纪60年代即进入人口机会窗口^[14],到2010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开始发生转折^[46],并最终持续至2013—2015年前后^{[14][44]}。也有研究指出,劳动年龄人口增速不等于绝对数量,我国的人口红利开启于1982—1990年^{[20][46][47]},峰值出现于2010—2015年^{[12][30][48]},最终将持续到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

初^{[12][46]},甚至是30年代下半期^{[2][48]}。此外,尽管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启了人口红利分类研究的尝试,但学界对其是否称得上一次独立的人口机会存在一定争议。从产生机制来看,第二次人口红利被提出时主要关注的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背景下居民储蓄行为的变动及其引发的资本深化效应^[49],本质上仍是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来定义人口红利^[7]。且在时间进度上,第二次人口红利一般开始于人口转变后期阶段,亦即导致第一次人口红利结束的老年人口力量引发了第二次人口红利^{[19][21]}。因此,部分研究将第二次人口红利归类为第一次人口红利的“第二阶段”,而将质量型人口红利视作另外一个意义上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的各种争议,根本上源于经济学和人口学研究范式缺少必要的对话与互动:人口红利概念最初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被提出,囿于将人口抚养比等指标作为人口红利的测度变量来纳入增长核算或增长回归模型,但对复杂的人口形势和条件考虑不足,由此降低了对人口要素禀赋与经济发展关系认识的准确性;而人口学对人口红利的研究则侧重于使用各种人口指标观察其变化趋势,考虑得更为周全,但重点放在了描述生育、死亡、迁移等基本人口过程,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也以人口要素自身为落点^[50],没能将人口转变的一般性特征与其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贡献相结合来考量。

2. 关于其他人口红利概念的争论

从具体的研究过程来看,目前的本土化研究对“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准确概念仍然缺乏统一明确的界定,且对“第二次人口红利”和“广义人口红利”概念的使用存在一定泛化问题。一方面,部分研究将人口红利界定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30][51]},事实上,这是对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概念的混淆。人口机会窗口是基于客观人口规律的人口学概念,指代人口年龄结构具有生产效应的机会时期,在该阶段,劳动力资源供给充足,社会抚养负担相对较轻。而人口红利是建构在前者基础上的经济学概念,是基于人口机会实现的经济增长效益^[49]。因此,人口在数量规模、年龄结构、健康状况、教育素质、流动迁移等方面发展变化所产生的人口机会不是直接的经济增长效应,即人口机会不等同于人口红利,二者之间的转化还需要与人口机会相匹配的社会经济政策^{[52][53]}。另一方面,人口红利依赖于特殊的人口条件,因而具有很强的时限性^[5],人口特征终究会在人口红利中转

向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但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在认识上具有将人口红利永恒化的倾向。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期式微后,又进一步提出了人口质量红利与广义人口红利等类型,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人口红利的研究维度,但也使人口红利的概念范围逐渐脱离了最初的人口转变范畴,与传统人口红利理论的衔接性不足。

3. 关于人口机会窗口与人口红利测算方法的争论

与此同时,学界对人口机会窗口的判断标准和人口红利的测算方法尚无定论^[31]。理论上的人口负担系数是被广泛接受的传统度量方法,包括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社会抚养比等^{[14][44][46]},对人口机会窗口较为常见的判断标准是总抚养比不超过50(0~14岁未成年人口与65岁以上老龄人口之和/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下同)^{[12][20]},或是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依据^[52]。然而这一衡量标准的准确性受到很多质疑,有学者提出人口抚养比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只能判断人口抚养负担轻重的相对程度,而无法直接确定人口机会是否形成。部分研究基于此对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的衡量指标作出进一步修正,通过参照各类标准人口提高其测量准确性^①,如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20]、相对静态人口^[4]、临界劳动年龄人口和静止人口等^[47],但目前仍然缺少确定标准人口的有效方法。而为反映出“红利”的经济学内涵,也有研究采用实际抚养比(有效生产人口与有效消费人口之比)为核心变量^[19],或是考察真正进入生产过程的就业人口和经济活动人口的基本情况^[47]。

四、现阶段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的核心议题

在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人口结构特征出现标志性变化的背景下,如何判定我国人口发展在第一次人口红利中的所处阶段并延续第一次人口红利,如何干预、应对人口负债,如何认识和分析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作用机制与替代效应,以及挖掘其他类型人口红利的驱动作用,正在成为学界关注的新议题。

(一) 第一次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随着我国婴儿潮时期出

生的人口逐渐步入老年阶段,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1953年的约3.37亿人增长至2013年的10.06亿人的峰值后开始下行,到2020年约为9.68亿人,其占总人口比重在2010年达到74.53%峰值,到2020年下降至68.55%,15~64岁经济活动人口在2011年达到7.69亿人的峰值后也开始减少。与此同时,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0~14岁未成年人口/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下同)从1964年的最高值(分别为79.40%和73.01%)先后持续下降至最低值(分别为2010年的34.28%和2011年的22.10%),而后上升至2020年的48.88%和26.18%,老年抚养比(65岁以上老龄人口/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下同)则从1964年的最低值(6.39%)稳定上升至2020年的19.70%^[54],表明我国社会抚养负担有所增加,且老年抚养比正逐步替代少儿抚养比成为总抚养比变化的主导因素。

在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和社会抚养负担加重的背景下,如何认识我国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所处阶段以及如何延续第一次人口红利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议题。事实上,劳动年龄人口的收缩是现代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尽管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走向下行,但现阶段劳动力总量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仍居历史高位,学界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27年前将保持在10亿以上,且占总人口比重到21世纪末仍超过54%^[55]。同时,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也为延续第一次人口红利创造了有利条件,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为延展传统型人口红利期提供可能^[28]。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60~69岁低龄老年人占全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55.83%^[56],相关研究测算,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06年,其中60~69岁低龄老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7.75年^[40],低龄老年人口的庞大规模及其在全体老年人中健康和教育水平的相对优势,奠定了二次发现有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中增长率方案)预测数据,我国低龄老年人口在2030—2055年将稳定在2亿左右,若在未来30年内将男性和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均渐进式延迟至65岁,将有0.9亿—1.2亿的55~64岁女性人口和0.4亿—0.6亿的60~64岁男性人口从低龄退休人口转

① 在人口红利相关研究中,直接以各种指标衡量人口机会是否形成,可能会导致偏倚,部分研究选择某个有代表性的参照人口或构造特定的标化人口,亦即标准人口,并将标准人口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口结构进行对比,从而提高判断的准确性和可比性。

为有效劳动力^[57],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轻社会抚养负担,扩大劳动供给。

此外,与人口红利相对应,人口负债是指预先支付而未来要偿还的人口发展代价,当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低于总人口增长率或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开始下降时,人口红利就转变为“人口负债”^[58]。从长期增长的角度来看,“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可能是相互抵消的,即在人口红利时期作出过贡献的人们步入老年阶段后,将不可避免地对社会福利体系造成压力^[20],衍生出用工成本上涨、创新动力不足、人力资本积累减缓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等问题。在我国人口增长开始低于更替水平之后,已有部分研究开始关注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的特征和趋势,从更多维度认识人口负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渠道,并强调通过适度干预,降低人口负债潜在的负面影响^[59]。《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也说明了当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型后,国家已从战略层面借助积极主动的政策设计来应对人口负债的冲击^[60],为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提供支撑。

(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作用机制与替代效应

人是经济生产和社会活动的主体,长期以来庞大的人口和劳动力规模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而随着劳动力资源低成本无限供给的时代走向结束,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虽仍然存在但逐渐减弱^[26],以预防性储蓄和人力资本积累为依托的第二次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正在开启^{[30][52]},并逐渐取代传统的第一次人口红利,成为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主导力量^[61]。

一方面,以资本形式进入市场的预防性储蓄是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要机会。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家庭储蓄同时存在预期财富效应和赡养负担效应^[49],如果制度安排没能使老年人在年轻时储备足够的养老资本,那么其老年阶段将会过于依赖公共转移支付和家庭代际支持^[21]。为鼓励居民加强养老预期储蓄、动员更多社会资源投入经济活动,近期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6]。我国学界部分研究也已经关注到养老计划和资本市场对深化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驱动作用,包括完善的私人养老储蓄系统、专门的养老储蓄保障项

目、畅通的私人投资渠道等^{[1][62]}。

另一方面,对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研究注重劳动力质量带来的生产效能。健康状况的改善是积累人力资本的途径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持续扩大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通过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统一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行健康中国战略等举措构建起中国特色的健康管理体系,民众的医疗水平和营养水平大幅提高,婴儿死亡率和儿童死亡率等主要死亡指标也显著下降。根据《2022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90岁提高至2021年的78.20岁^[63],为劳动者延长劳动参与时间提供了必要前提,从健康维度拓宽了第二次人口机会窗口^[28]。同时,义务教育制度和高等教育扩张孵化了教育层面的人口质量红利^[24],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5.30年增长至2020年的9.91年,1982年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仅为602万人,占比0.62%,到2020年增至15.47%,达到近2.2亿人^{[64][65]},2020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升至10.75年,其中43.79%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23.61%为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66]。学界在测算教育水平提高所产生的经济动能时指出,自2016年起,我国劳动力素质的改善每年约产生2%的经济增长率^[26],且教育资本的经济贡献率高于健康资本的贡献率^[29]。

(三)其他类型人口红利的驱动作用

为综合应对我国复杂的人口形势,近年来人口学界开始挖掘新型人口红利动能,在两次人口红利之外关注性别红利、长寿红利、老年人口影子红利等广义人口红利的潜在价值。

一方面,我国仍处于老龄化前期阶段,加之人口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持续改善,老年人口具备极强的消费潜力和生产潜力。老年人除了可以通过各种正式就业和非正式社会参与,重新投入到社会生产过程中,还可以通过消费活动刺激需求端的经济增长^[40]。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21—2022》预测,到2050年,我国老龄人口的消费动能将达到40.7万亿—6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12.2%—20.7%^[67]。现有研究也已关注到庞大的银发经济市场规模,以及银发经济消费方式的多元化倾向,即老年人文化、休闲、娱乐等消费大幅提高,并开始注重消费品质和服务体验,或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41],这会有效释放长寿红利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同时,大量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正通过隔代照料

以及家务劳动等代际支持,有效减轻劳动力(尤其是女性劳动人口)的工作—家庭失衡问题^[68],使其维持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和生产率,进而间接地为经济增长作出生产性贡献,并释放老年人口影子红利。

另一方面,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国女性人力资本积累迅速提升,义务教育阶段性别差距基本消除,两性平等接受高中阶段教育得到巩固加强,而本专科、研究生等各类高等教育中女性占比已经超过男性,性别红利蕴藏着极大的生产潜能与社会效益。不过,在就业层面,近年来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有所下降,从1990年的73.09%降至2020年的59.10%^[69],同年女性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为43.5%^[70]。学界逐渐意识到女性在求职、晋升、培训等职业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压力和障碍^[71],开始注重分析劳动力市场中职业性别隔离、性别收入差异等结构性歧视对女性生产潜能的浪费,并从保护女性职业发展、性别平等建设、促进女性赋权等方面讨论性别红利的获取途径^{[15][37]}。

(四)制约我国人口红利释放的主要因素

21世纪以来,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在人口红利的不同表征之外,学界进一步关注人口红利最终能形成的经济贡献,以及从人口机会向实际增长转化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如劳动力供需的结构性失衡、区域分布与空间发展的不协调等。

从总体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来看,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人口资源依然丰富,但劳动力市场上仍然存在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问题^[72]。而充分就业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未能实现就业的劳动力人口在本质上与被抚养人口同为消费型人口,导致人口机会转为劳动力相对过剩和人力资源浪费^{[13][73]}。同时,我国劳动力技能与经济建设需求之间还存在结构性失衡,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所输出的劳动力素质并不能完全满足生产建设的需要^[59],这直接影响了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和利用率,制约了人口红利的有效释放。

此外,区域发展差异是我国长期以来的基本国情。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不满足空间匀质的假设,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与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一样会出现集聚现象,特定地区内的人口红利是本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和地区间人口流动共同作用的结果^[74]。一方面,我国人口流动表现为

区域性失衡。2020年东部地区吸纳跨省流动人口比重高达73.54%,相较之下,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仅为7.65%、15.06%和3.75%^[65],而人口聚集会通过竞争效应或溢出效应影响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对其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产生持续的集聚与吸附作用^[48]。另一方面,我国各地区人口红利的人均贡献水平不同,劳动力价值均值大体上呈现由东部地区依次向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递减的空间变化趋势^[75]。受此影响,东部地区人口红利的供给规模和实现效率均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这种不平衡的劳动力空间配置导致中西部地区人才流失严重,也导致一部分东部发达地区面临结构性就业压力,加剧了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困境,也对人口红利的开发造成了严重障碍。

五、下一步中国人口红利本土化的研究展望

我国人口红利的表现形式正在发生历史性变迁,面对新的人口发展态势,亟须构建起更加符合现实情况的人口红利分析框架,从概念界定、衡量标准、影响机制、实现路径等方面形成关于人口红利的学术体系。具体而言,下一步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可以将以下议题作为基本落点。

(一)理性看待数量型人口红利变动

人口转型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具有周期性和时效性,因而人口红利并非永续性概念,在人口机会窗口后期,虽然人口转变的持续推进造成了数量维度的人口机会收缩,依托劳动力规模和成本收获人口红利的边际效益正在递减,但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尚在,劳动力供给仍然充沛^[61]。同时,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和生命健康期的延长意味着老年人社会参与和劳动参与的时间有进一步增长的可能,加之居民总体教育水平仍在不断提升,随着老年人代际转换,老年人力资本开发的有效性也会随之提高^[76],激活老年人口生产性特征、促进老年人经济社会参与、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将成为延长数量型人口红利的重要抓手。

然而,受限于长期实行的退休年龄规定,目前我国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仍然较低,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人口的基本情况,现行的退休制度仍有相当大可以拓展的空间^[77]。基于此,未来应进一步从适应人口老龄化规律与老龄社会形态的角度出发,对老年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释放和再利用展开深入研究,聚焦促进老年人再就业和参与社会公益、社区服务、志愿服务等非正式活动的制度机制,分析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可

能产生的劳动力供给与经济效益,探讨老年人就业相关配套保障和服务平台的构建与运作,尤其注意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就业特殊群体。同时,为贯彻落实积极老龄观,学界还应关注现实存在的年龄歧视问题与“老年友好型”社会体系的建构,从而提升老年人参与劳动的主观意愿,延长社会总体生产性时长。

(二)注重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形成要素

作为另外一个意义上的“第二次人口红利”,人口质量红利逐渐替代人口数量红利而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30],人口红利研究应进一步关注人口质量对人口数量替代作用的实现机制,以及替代作用实现后如何将其效益最大化。

构建全方位的健康保障和高质量的教育体系是强化质量型人口机会的首要前提,人口健康素质和教育素质的深化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人口红利的培育重点。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再次强调,要深化教育卫生事业改革创新,把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全面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思想道德素质^[6]。基于此,学界应充分讨论如何有效改善人口和劳动力健康状况,保障其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需求,从而提升健康人力资本水平,释放质量型人口红利。同时,未来研究还应进一步关注生命周期视角下人力资本的积累通道,尽管我国人口整体教育素质已经接近部分发达国家水平,但劳动者所接受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职业训练等难以完全满足我国经济模式转型的现实需要,学界应意识到现实存在的教育与工作衔接问题,在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和双轨制教育体系之外,探讨如何促进教育培养与职业发展的有效衔接,避免教育系统结构性产能过剩,使质量型人口红利更加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关注人口红利配置结构及其优化

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提出,数量型和质量型人口红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贡献于经济增长,会受到人口红利配置结构的影响,即劳动力资源在不同区域的流动以及人力资本在各产业或行业间的流动与其产生的经济效能直接相关。

长期以来,我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人口红利存在不平衡性,不仅导致人口数量红利的结构性浪费,也阻碍了人口质量红利的释放。学界未来应对人口红利的空间配置机制展开进一步研究,将人口要素与制度设计结合起来,讨论如何以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来缩

小城乡与地区发展差距,并通过清除制约人口迁移流动的制度壁垒,提升生产要素的流动效率,从而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扭转人力资源在地区层面的错配现状,更好地释放人口红利存量。此外,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劳动力资源在产业间和产业内的优化配置能够有效提高总体劳动生产率^[43],从而实现要素资源效益的最大化,而现阶段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分布形态与产业结构严重不匹配,降低了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78]。未来应通过对就业结构的估算和就业形态的预测,推动建立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促进机制,在扩大就业容量的同时提升就业质量,并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匹配的层面,探讨转变劳动力开发模式的可能性,为充分利用数量型和质量型人口红利拓宽空间。

结语

总体而言,人口红利作为复合性概念,融合了人口学、经济学、老年学、女性学等学科的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我国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经历了萌芽阶段、起步阶段、延伸阶段、拓展阶段,学界对第一次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第二次人口红利及其替代效应、广义人口红利的作用机制等议题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探讨,同时也关注到制约我国人口红利释放的主要因素。但从学理层面而言,人口学与经济学研究范式仍缺少相互对话,人口红利研究存在概念误读、测算片面的问题,研究方法碎片化、研究范式泛化倾向严重,导致学界对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期限及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界定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议,亟须建构体系化的研究理论和标准化的研究方法,廓清概念边界和测算标准,从而形成独立有效的研究领域。

同时,人口红利根植于现实的人口条件,其表现形态和收获方式随人口要素变动而改变。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发展的关键转折期,现代化建设的人口基础发生深刻变迁,人口红利形态的规律性转型已成定局,新时代的人口机会越来越取决于储蓄行为、人力资本、女性参与、健康促进、充分就业等多元因素。面对以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以及人口负增长为代表的人口发展新趋势,未来人口红利研究应充分关注新形势下的新问题,聚焦我国人口变动的基本趋势及其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各类矛盾,提高研究成果的指导性和应用性,切实激活我国潜在人口红利、创造新

的人口机遇,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 [1] 王丰.人口红利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吗?[]].人口研究,2007(6):76-83.
- [2] 徐诺金,姜再勇.论我国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平衡[]].金融发展评论,2015(8):13-35.
- [3] 封小郡.对“人口红利”概念本土应用的反思——从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与否的争论说起[]].人口与社会,2014(2):10-15.
- [4] 杨帆,黄少安,JULIEN PICAULT.中国人口红利结束了吗?[]].山东社会科学,2017(4):82-89.
- [5] ROSS J. Understanding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Policy project note, 2004:1-8.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EB/OL]. [2023-05-06]. http://www.gov.cn/yaowen/2023-05/05/content_5754275.htm.
- [7] 原新,金牛.新型人口红利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河北学刊,2021(6):109-116.
- [8] 陆旸.为什么“人口红利”没能在所有国家出现?——一个历史经验的视角[]].劳动经济研究,2020(3):3-31.
- [9] BLOOM D E, WILLIAMSON J G.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8, 12(3): 419-455.
- [10] NAFIS S. The 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1998[M]. New York: UNFPA, 1998:14.
- [11] BLOOM D, CANNING D, SEVILLA J.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M].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03.
- [12] 于学军.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中国人口科学,2003(1):11-16.
- [13]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研究,2004(2):2-9.
- [14] 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人口研究,2004(5):2-11.
- [15] 杨菊华,卢瑞鹏.性别红利:理论意涵、基本特征与社会效应[]].山东社会科学,2021(3):51-59.
- [16] 周健.刘易斯转折区间日本人口发展战略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改革与战略,2021(10):86-95.
- [17] 毛新雅,彭希哲.城市化、对外开放与人口红利——中国1997—2010年经济增长的实证[]].南京社会科学,2012(4):31-38.
- [18] 王红梅.充分兑现人口红利 实现经济持续增长[]].西北人口,2008(1):30-34.
- [19] MASON A, LEE R. Reform and support systems for the elder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pturing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Genus, 2006: 11-35.
- [20]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5(6):23-29.
- [21] LEE R, MASON A. What i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Finance & development, 2006: 17.
- [22] 李超,罗润东.老龄化、预防动机与家庭储蓄率——对中国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证研究[]].人口与经济,2018(2):104-113.
- [23] 袁志刚,宋铮.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与最优储蓄率[]].经济研究,2000(11):24-32+79.
- [24] 詹韵秋,王军.人口质量红利: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重庆社会科学,2020(2):21-32.
- [25] 陈对.我国人口质量红利影响因素研究[]].统计与决策,2015(10):88-91.
- [26] 李钢,梁泳梅,沈可挺.质量型人口红利对中国未来经济影响评估[]].China economist, 2016, 11(1): 112-125.
- [27] 余静文,苗艳青.健康人力资本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161-175.
- [28] 原新,金牛.中国人口红利的动态转变——基于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视角的解读[]].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31-40.
- [29] 杨建芳,龚六堂,张庆华.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包含教育和健康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其检验[]].管理世界,2006(5):10-18+34+171.
- [30] 杨成钢,闫东东.质量、数量双重视角下的中国人口红利经济效应变化趋势分析[]].人口学刊,2017(5):25-35.
- [31] 原新,刘绘如.中国人口红利研究的发展——基于文献综述视角[]].西北人口,2019(5):60-68.
- [32] CARMEN PAGÉS, CLAUDIA PIRAS, SUZANNE DURYEA, NORBERT SCHADY. The gender dividend: capitalizing on women's work[M].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10:2.
- [33] UN Women, The Gender Dividend: A Business Case for Gender Equality[EB/OL]. [2023-05-05]. <https://www.unwomen.org/en/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2011/12/the-gender-dividend-a-business-case-for-gender-equality>.
- [34] 朱荟,陆杰华.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性别平等视角下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理论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41-50.
- [35] 石智雷,张婷皮美.性别红利: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

- 新视角[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0(3): 61-70+159.
- [36] 杨云彦, 石智雷, 张婷皮美. 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J]. 人口与健康, 2019(1): 7-8.
- [37] 陆杰华, 汪斌. 中国性别红利的发展潜力、制约因素及其战略构想——基于性别平等视角[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0(3): 63-71.
- [38] OLSHANSKY S J, PERRY D, MILLER R A, et al. In pursuit of the longevity dividend: what should we be doing to prepare for the unprecedented aging of humanity?[J]. The Scientist, 2006, 20(3): 28-37.
- [39] OLSHANSKY S J. From lifespan to healthspan[J]. Jama, 2018, 320(13): 1323-1324.
- [40] 原新, 王丽晶. 中国长寿红利: 人口机会、政策环境与开发方向[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2(2): 57-63.
- [41] 陆杰华, 林嘉琪. 长寿红利时代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战略视野及其行动框架[J]. 行政管理改革, 2022(1): 20-25.
- [42] 杨成钢, 孙晓海. 老年人口影子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J]. 人口学刊, 2020(4): 30-41.
- [43]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J]. 经济评论, 2017(3): 4-16.
- [44] 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 经济研究, 2010(4): 4-13.
- [45] BONGAARTS J. Human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J].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009, 364(1532): 2985-2990.
- [46] 郭晗, 任保平. 人口红利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 当代财经, 2014(3): 5-13.
- [47] 王广州. 中国人口机会窗口与人口红利再认识[J]. 中国人口科学, 2021(3): 2-16+126.
- [48] 钟水映, 李魁. 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 2010(4): 14-23+186-187.
- [49] 孟令国, 李超令. 我国二次人口红利的困境摆脱与现实愿景[J]. 改革, 2013(1): 149-157.
- [50] 蔡昉. 人口红利: 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有益框架[J]. 经济研究, 2022(10): 4-9.
- [51] 车士义, 陈卫, 郭琳.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J]. 人口与经济, 2011(3): 16-23+77.
- [52] 原新, 高瑗, 李竞博. 人口红利概念及对中国人口红利的再认识——聚焦于人口机会的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17(6): 19-31+126.
- [53] 刘元春, 孙立. “人口红利说”: 四大误区[J]. 人口研究, 2009(1): 81-90.
- [54] 国家统计局. 年度数据[DB/OL]. [2023-05-05].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 [55] 睢党臣, 程旭, 吴雪. 人口结构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基于中日两国的比较[J]. 经济体制改革, 2020(5): 156-163.
- [5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 这些数据事关“老”话题[EB/OL]. [2023-05-05]. <https://www.mca.gov.cn/article/xw/mtbd/202105/20210500033740.shtml>.
- [57]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EB/OL]. [2023-05-05].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d/new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2019-0>.
- [58] VAN DER GAAG N, DE BEER J. From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demographic burden: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eing on economic growth in Europe[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15, 106(1): 94-109.
- [59] 张鹏, 施美程.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 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问题研究[J]. 江淮论坛, 2021(6): 20-27+82.
- [6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EB/OL]. [2023-05-05]. https://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shtml.
- [61] 晏月平, 李新宇. 人口红利期结束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挑战与机遇[J]. 人口与社会, 2018(1): 19-31.
- [62] 王树. 老龄化、二次人口红利与家庭储蓄率[J]. 当代经济科学, 2020(6): 88-95.
- [6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EB/OL]. [2023-05-05]. <http://www.nhc.gov.cn/mohwsbwstjxxzx/tjtjnj/202305/6ef68aac6bd14c1eb9375e01a0faa1fb.shtml>.
- [64] 国家统计局. 沧桑巨变七十载 民族复兴铸辉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EB/OL]. [2023-5-05]. 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0355.html.
- [65] 国家统计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EB/OL]. [2023-05-05]. http://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105/t20210511_1817280.html.
- [66] 人民网. 总量虽降, 人口红利仍在[EB/OL]. [2023-05-05].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21-05/19/content_3049135.htm.
- [67] 党俊武, 王莉莉. 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21—2022)[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16.
- [68] 杨菊华, 孙超. 论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母职双重税赋”[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9(1): 93-103.
- [69] World Bank.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female (% of female population ages 15+)[EB/OL]. [2023-5-05].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L.TLF.CACT.FE.ZS?locations=CN>.
- [7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EB/OL].

- [2023-05-05]. http://www.gov.cn/xinwen/2021-12/21/content_5663667.htm.
- [71] 王放. 中国妇女人力资源开发状况[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7(4):54-57.
- [72] 原新, 刘厚莲. 中国人口红利真的结束了吗?[J]. 人口与经济, 2014(6):35-43.
- [73] 陈卫, 都阳, 侯东民. 是人口红利?还是人口问题?[J]. 人口研究, 2007(2):41-48.
- [74] 王宇, 范英, 魏一鸣. 人力资本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J]. 数理统计与管理, 2006(2):149-155.
- [75] 徐春华, 龚维进. 人口红利区域分布失衡与空间发展不平等: 劳动力价值低估视角[J]. 兰州学刊, 2023(3):31-48.
- [76] 黄凡, 段成荣.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质量红利——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 人口与发展, 2022(1):117-126.
- [77] 卢敏, 彭希哲. 基于期望余寿理论的老年定义新思考与中国人口态势重新测算[J]. 人口学刊, 2018(4):5-18.
- [78] 李静, 楠玉. 为何中国“人力资本红利”释放受阻?——人力资本错配的视角[J]. 经济体制改革, 2017(2):31-35.

(责任编辑 魏 新)

Reflection and Prospect of the Indigenous Research on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A Discussion on the Core Issues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Research

LU Jiehua, GU Yuchen

Abstract Popula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main body of economic activities. Since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demographic dividend has always been a key research topic in economics and demography. With the promotion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mode, China's actual population condition and economic situation have had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and it is urgent to recognize and reconstruct existing research on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 basic consensus, the focus of dispute, and the limitations of research paradigms, theoretical concepts, and research methods can be found from the evolution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research and the re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digenous research on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Meanwhile, the core issues of indigenous research on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at the present stage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first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demographic debt, the mechanism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its substitution effect, the driving role of other types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a broad sense, and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release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such as the structural mismatch of employment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difference. The next step of indigenous research on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should be based on issues such as the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demographic opportunity at the quantitative level, the cultivation of population potential at the qualitative level,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spatial allocation and industrial allocation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Key words demographic dividend; demographic opportunity window;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digenous research; quality-oriented demographic dividend